



重庆：让“两不愁”真不愁，“三保障”有保障

本报记者李勇、李松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既是底线性任务，承载着厚重的民生期待；也是一块“试金石”，检验着脱贫攻坚的质量、成色。近年来，重庆严格对标对表中央要求，将脱贫攻坚举措精准到个人，统筹到区域，让“两不愁”真不愁，“三保障”有保障，打响了一场高质量脱贫的攻坚战。

对标贫困“硬指标”，聚焦深贫开“药方”

在重庆石柱县，三年前摘掉了“贫困帽”的徐定英一家，在去年底却又突遭横祸：徐定英的孙女摔倒致颅内出血，两次住院前后花了20万元。

“摘帽不摘政策”——正当徐家人被重病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健康扶贫措施及时到位，伸出“援手”。经过多重医疗保障报销支持，徐家人医疗自付费用不到两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持续发力，地处西部的重庆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2018年底，全市动态识别的185.1万贫困人口中，有171.2万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7.1%降至0.7%。

落实“两不愁、三保障”，促脱贫和防返贫同样重要。重庆各级干部紧盯两个人群——全市还有10多万人尚未脱贫，还有少量已脱贫人口，一旦遭遇变故易返贫，需要进行动态监测。“无论是未脱贫户，还是脱贫监测户，都是脱贫的坚中之坚，更是当前帮扶的重中之重。”重庆市扶贫办主任刘贵忠告诉记者。

因病致贫是扶贫路上的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辛辛苦苦小康，大病全泡汤。”而类似徐定英这样的脱贫边缘户，能从因病致贫的重压下“翻身”，正是重庆精准发力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成果。

近年来，重庆在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同时，集纳资源，形成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为基础，医疗救助、扶贫基金为补充的健康扶贫保障体系。目前在重庆，贫困人口就医合规住院费用自付比例控制在10%左右，相关政策已惠及71万多人次。

除了医疗，住房安全、义务教育等基本保障也不能落下。在武隆区羊角镇永隆村，不少过去居住在土坯房、危旧房的贫困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旧房改造等政策，住进了安全敞亮的新房。

记者刚踏进贫困户蒋洪文家新房，老蒋就打开了话匣子：“家里房子建在1980年，早就老朽了。有一侧土墙倾斜，墙壁裂缝最宽的有好几厘米。”老蒋说，多亏了5万元危旧房改造补助，如今我家新房建起来了，下个月就准备搬进去，生活会越来越好。

全市因病、因厌学等原因辍学失学924人中，已通过动员上学、送教上门等方式全部接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的3076户中，已改造2993户……一个个数字，就是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民生承诺。“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已将前期摸排涉及‘三保障’等方面的5155个问题，认真对账销号，已解决5076个。”刘贵忠说，剩下未解决问题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部销号，绝不在高质量脱贫这张“答卷”上丢分。

集聚资源，政策协调……集团帮扶优势不断显现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难点在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人口。为此，在“解深贫”过程中，重庆还主动作为，创新政策，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作为解决“两不愁三保障”，落实脱贫攻坚的重点。每个深度贫困乡镇由一名市领导担任脱贫攻坚指挥长，对脱贫攻坚负总责。由重庆市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组建扶贫集团，选派450名领导干部驻乡村，直接帮扶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号令一下，帮扶集团的干部走出机关，背上行囊，同区县、乡镇干部一道，访民情、解难题、做规划、推项目，在扶贫攻坚的前沿地带扎根，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正在成为重庆攻坚深度贫困，构建大扶贫格局过程



▲9月3日，在莲花小学操场上，穆翼（后中）在教陶瑞和学生跳绳健身操。25岁的穆翼是重庆市九龙坡区重庆铁路小学的一名体育老师，今年开学之际，她来到重庆市城口县蓼子乡的乡村小学——莲花小学，将辅助这里的老师陶瑞度过一周的支教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乡村小学，老师都得身兼数职。城里来的老师穆翼，不仅成了村小老师陶瑞的得力同事，还为莲花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更多新鲜的经验。穆翼给孩子们上体育、美术和音乐课，给孩子们讲述大山外面的世界，让山里的孩子们接触更多的新知识。

据介绍，九龙坡区重庆铁路小学与城口县蓼子乡第一中心小学开展结对子帮扶活动一年多来，城市老师下乡交流给当地乡村老师带来了更多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对进一步提升贫困地区教学质量有极好的促进作用。

中一支关键力量。业培训，甚至在重庆市级大医院找到了就业岗位，月薪多在4000元以上。

“我们帮扶集团43家成员单位，其中就包括不少医疗机构，他们对护工需求量大，正好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适岗对路的就业岗位。”重庆卫健委扶贫集团驻金溪镇工作队干部沈鹏说，从去年4月以来，区里已举办了六期“金溪护工”培训班，有300多人接受培训，其中近一半是贫困户，“培训一人、就业一岗、脱贫一户”。

落实“三保障”，关键靠筑牢民生“网底”；解决“两不愁”，重点要有稳定增收渠道。重庆依托优势产业做文章，为贫困户量身定制帮扶措施，推动懂技术、有资金的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户联产联业、联股联心。强化利益返还、保底分红等机制，让群众持续受益……

记者最近走进武陵山区，浙浙沥沥的小雨落个不停，火红的辣椒娇艳欲滴。在地里，75岁的石柱县上进村村民马世辉摘辣椒手脚利落，不输年轻人。

石柱是重庆辣椒主产区，常年种植面积10多万亩，光是搭上辣椒产业快车的贫困户就有2000多户。

“我们种辣椒，一不愁技术，有专业合作社统防统治，技术员下地指导；二不愁市场，有龙头企业订单敞开收购。”马世辉说。辣椒这项“火红”的产业让老马的生活日渐红火，2016年他顺利脱贫。

用好活扶贫资金，改“补”为“股”，变对贫困户的“松散带动”为“股权激励”——重庆推出财政涉农补助“配股到户”，让贫困户或脱贫户参股到合作社中，依托产业持续增收。

在上进村，马世辉就连续拿了两年扶贫股金分红，每年又能增加近千块钱，加上其他收入，全家脱贫后的生活能稳定下来了。

“在脱贫攻坚以来，县里筹资，帮同心村修建了11口蓄水池，大池连着小池，互补有无，汩汩清水流入农家。”

但群众还有担心：如今是有水喝了，但过个几年，水池水管老化堵塞了咋办？又让政府投钱再修吗？

“群众自管水管，水才能长流。”同心村支部书记吴吉财说，在县水利部门的指导下，村里成立了人饮协会，包括贫困户在内的320户农民自愿加入，并按每吨水0.7元标准缴水费。

钱袋满了，脑袋也不能空。从目不识丁到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苏国文的经历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一个缩影。退休回村后，他还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发展教育。

作为芒景村小学的名誉校长，学校成了苏国文每周必去的地方。“现在孩子上学都是车接

车送。”几年前，景迈山古茶园申遗工作启动，苏国文又有了新“任务”。为引导村民积极参与，他联合有关部门编制了《芒景村遗产保护学习手册》，发给村民人手一本。

截至目前，芒景村15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仅有一户还未脱贫出列。发展生态茶、开民宿、搞旅游……2018年，芒景村经济总收入7300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532元，村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看着生机勃勃的景迈山，苏国文有了新的三个梦想：把教育进一步办好，当地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实现腾飞；把生态茶园改造进行到底；永远保护好生态。

“农民有意愿自己管水、护水，政府也积极给予支持，每年投入1万元经费补助。水利设施运行、管护收支相抵有些结余，实现良性运转，同心村的‘饮水难’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石柱县水利局副局长陈世权说，如今，同心村的经验正在复制成长，县里已经制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办法》，鼓励发展农村饮水协会，让水利扶贫的成效“管长远”。

扶贫基础设施建起来了，要管好用好。农村产业发展，也不能光想着投入建起来，还要考虑如何做大做强，做长远。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资产经营、保底入股等方式，改革运行机制，让扶贫产业有更强的发展“主心骨”。

在重庆荣昌区河中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牵头，“瞄准”濑溪河河中的旅游资源，为乡村旅游做好配套服务，发展收益相对稳健的旅游物业租赁经济。“另外，集体经济组织还与社会资本合股联营，对旅游步道进行统一改造，并购置了旅游电瓶车、自行车，相关旅游收入按比例分成。”当地村干部说，走市场的路子抓旅游扶贫，产业的生命力才能更旺盛。

——创新政策，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就业、创业，让乡村扶贫多些“新鲜血液”。

在石柱县中益乡，在扶贫贷款、土地流转等利好政策的吸引下，“85后”的宋健就在打造一项“甜蜜”的事业。他返乡创业两年多，领着乡亲们规模化养殖中蜂，蜂蜜收购范围覆盖全乡上千农民，让原生态蜂蜜成为群众致富产业。

据重庆市委组织部统计，重庆通过实施本土人才回引工程，吸引0.86万人返乡创业，他们扎根农村，正在成为“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发展“起点”

近年来，重庆坚持“全市一盘棋”的要求，花大力气解决贫困问题：全市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1918人，驻村工作队队员4401人，落实结对帮扶干部达20多万人……“扶贫领域‘精耕细作’，才换来贫困群众由衷的赞誉好评。”

“在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之时，最忌松懈、滑坡，更不能有‘差不多、歇口气’的想法。”刘贵忠说，高质量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要把“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记在心里，扛在肩上。

在渝东南武陵山深处，有一个复兴村。远观村里层层叠叠的水稻田，宛如镶嵌山间的块块美玉。这几年，靠着这些绿色、洁净的土地资源，当地老乡一亩地种出了3000多元的水稻产值，群众脱贫有了主心骨。

“复兴村摘掉‘贫困帽’，走上‘复兴路’，最感谢的还是张书记。”群众口中的张书记，正是复兴村第一书记张向东。

好山好水能种好稻。但过去群众一家一户种植，稻种乱、价格低，好生态没能带来好效益。在张向东牵头组织下，复兴农民“抱团取暖”，以股份合作社为平台，统一稻种采购、种植流程和销售渠道。

“这几年合作社重点做了两件事：一是坚持绿色标准，300多亩核心种植区域，保证全程‘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有机肥。二是与专业化公司合作，打造、推广‘龙洞贡米’品牌，线上、线下统一销售，提高稻米附加值。”

这是张向东驻村第三个年头，他还将继续在村里“扎下去”。最近，他正忙着组织工人调试村里大米加工厂的设备，“我们自己建一条稻谷加工包装线，既帮外地稻谷加工，收些加工费，也能把本地优质稻增值收益留在村里，村集体收益能更上层楼。”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在黔江区金溪镇，今年产业投入还在继续发力，蚕桑种植1万多亩，镇里与下游企业紧密对接，蚕丝订单不愁；还引来农业专家，在蚕桑地里套种羊肚菌，由此成长起来的“立体农业”，亩均产值更是翻了一两倍……

在武隆区沧沟乡青岗村，通村通社的公路已经修通，小村不再孤僻。村支两委正和群众合计，把村里原来的川黔古盐道、古驿站资源好好盘活利用起来，把“小而美”的乡村文化旅游点，红红火火地建起来……

云南：景迈山上布朗族两代人的“三个梦想”

新华社昆明12月11日电（记者王长山、吉哲鹏、严勇）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上的芒景村，76岁的布朗族老人苏国文家两代人先后许下不同的梦想，这些梦想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当地少数民族生活的巨大变迁，也折射出新时代当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心。

郁郁葱葱的景迈山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境内，是重要的产茶地之一。由于地处偏远，产业结构单一，长期以来当地群众生活困难。新中国成立时，芒景村村民住的是窝棚，寨子不通电，晚上黑黢黢的。“很多人只有一套衣裳，洗了就只能穿在家里。”窘迫的场景深深刻在苏国文脑海中。

“直到新中国成立，从我父亲苏里亚这一代人开始，我们这儿的少数民族群众才开始真正拥抱

大山以外的生活。”苏国文说，也就是那时候他的父亲许下了家族愿望。

在旧社会，苏里亚是芒景村的头人，新中国成立后跟着共产党走，成了国家干部。苏里亚也成为少数民族国家观礼团的一员。1951年，苏里亚从北京归来，便在寨子里开大会，当着村民说了三个梦想：只要跟党走，总有一天公路会挖到山顶上；只要跟党走，总有一天会用铁牛来犁地；只要跟党走，总有一天会过上白天黑夜都光明的日子。

苏国文说，从那时起，借助党和国家的政策，景迈山人也开始了追求过好日子的奋斗之路，生活也不断迈上新台阶。

20世纪70年代，景迈山上有了第一所学校；